



自由談

一九四九年，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開會通過每年六月一日為國際兒童節。其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規定每年十一月二十日為世界兒童節。此外，各國還有各種的兒童節日。這麼多的兒童日，可見孩子們受到了非凡的關心。可是，眼下的孩子幸福嗎？

前些年，一位美國女士被評為「世界上最糟媽媽」，原因是她讓自己九歲的兒子獨自在紐約乘坐地鐵。她為此承受了嚴厲的譴責，甚至面臨因危害兒童罪而被逮捕的威脅。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筆者童年那一代的母親都有可能榮獲「糟媽媽」稱號。

這位紐約母親不服氣，她跟輿論較上了勁，出了本《放養孩子》的書；還拍了十三集電視片在探索生活頻道播出，名字就叫《世界上最糟媽媽》，引發了軒然大波。

其實，這是個世界性的話題。很多學者專家都加入了討論，共同結論認為：美國現行教育政策有很多不妥之處。上一代孩子童年時獨自或結夥逛遊街、去公園或郊遊的自由被粗暴取消了。「我們剝奪了他們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生活的機會」，波士頓學院教授彼得·格雷寫道。他提出，這加大了今天孩

兒童日，話成長 海龍

子們「感到焦慮、抑鬱，及其他各種精神障礙的可能性」，而這些導致年輕人精神障礙的發病率近幾十年急劇提高。在專家們看來，孩子們在沒有成年人監督的情況下在外玩耍，儘管有風險，但卻是學習控制憤怒和恐懼等強烈情緒的方法。

基於此，有人提出要挽救童年。統計學數字顯示，孩子們百分之九十時間都在家中與學校度過。這導致了政府、法律、學校、家長都成了超級保姆，把孩子控制得死死的。保護得這樣充分，可今天的孩子比他們上一代更優秀了嗎！——問得好。

其實，眼下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應付生活的智商和情商能力日趨幼齡化。美國大學求助處午夜接到報告常常有同學間起謔名、發現老鼠受到驚嚇之類糾紛。因之，有教育者慨嘆：現在的學生除了讀書，啥也不會。

這些年，美國有教育家和有識之士提出了「當個野孩子」的口號。他們認為孩子要會玩才會學。美國統計數字顯示，六十年來，現在孩子童年戶外玩耍時間遠不及父輩的一半。今天兒童抑鬱症和焦慮症飆升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五到八倍，這與兒童自由玩耍時間的減少有關。格雷博士說：「童年本就应该自由玩耍，這段時光不是用來打造漂亮的大學入學簡歷的。」其實，現在的孩子不夠優秀，不是學得少而是玩得少。

玩，活動，當然包括勞動、包括受苦，這些能夠培養孩子互動、合作協調和領導力。也給孩子創造獨自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古人最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提倡童年時要經風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毛澤東也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



六月一日是國際兒童節

資料圖片

白腰朱頂雀

任林學



鄉愁的胎記

白腰朱頂雀說不準什麼時候會來。也許是春天，也許是秋天，也許四時長留不去，但那已經是我心裏的事情了。

那鳥兒，像北方最美麗的愛情，既有漂亮迷人的羽毛，又有攝人魂魄的啼鳴。一旦入了眼，就再難相忘；一旦過了手，即致夢牽魂繞。

深秋時，我們用一種竹篾築成的籠子，誘捕白腰朱頂雀。那鳥兒經常從遠處的山林或藍天裏炫然而降，但就在啄食穀粒的時候，一個跟頭墜入我們預設的籠子。我們的心因此狂喜，而差一點兒躍出喉嚨，但同時也有絲絲縷縷的遺憾如隱痛在胸膛裏針刺般閃過。那麼聖潔的事物竟然也為俗利所惑，所陷落，總讓人極在極愛的情感裏生出一絲恨和怨。

所怨為何，那時年紀尚小，還不懂自省。後來，經歷過太多的愛恨情仇，才懂得，那不過是一種自私的本能，是一種隱秘、難以言說的憂慮或忌憚。既喜也怨的，無非是鳥兒的輕率和不辨真偽，幸好鳥兒沒有落入別人的籠子，而是落入了自己的籠子。世上的人啊，哪一個不認為只有自己的籠子才是天堂，而別人的籠子都是牢籠，都是地獄呢？！

然而，鳥兒並不了解我們到底有多愛它，還是拚命地用翅膀徒勞地撲打着籠子。可是，那空空的藍天有什

麼好的呢？連一顆金色的穀粒都沒有！這些難以理喻的鳥兒，它們究竟是為了飛翔才去尋找穀粒；還是為了找到穀粒而不斷飛翔？

鳥兒的驚惶失措，立即引發了我們內心的恐慌。鳥兒拚命地掙扎，是想掙脫籠子的幽禁，而我們的恐慌，則恰恰是它們的遠走高飛。鳥兒越是不安生，我們的心裏越是惶恐，到後來，我們覺得把鳥兒放在哪裏都不安全，只有攥在自己的手中才最可靠，最「把握」。

於是，我把鳥兒從籠子裏取出，攥在自己的手裏。近距離觀看鳥兒身上的那些鮮艷的羽毛——艷紅的胸羽如火，銀白的腹羽如雲，暗紅而近絳紫的頂羽，如燃燒之後的彩霞，閃爍着神秘的光澤；還有那雙精靈一樣的眼睛，當它們不停眨動，我彷彿看到了光明與黑暗交替顯現的另一個宇宙；當那些細小的羽毛與掌心接觸的一瞬，突然感覺到自己的心已被一種柔情般的柔軟所融化，彷彿有一對翅膀從意識裏生出來，展翅而飛，直至無限高遠。

無以復加的「珍愛」之情，成爲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讓我的手越攥越緊，彷彿稍一鬆懈，那本來屬於天空的精靈就會無影無蹤。到後來，我終於在疲倦中睡去，醒來，那鳥兒仍然握在手中，但它已經永遠也不會飛走了。

從此，我一直以爲手心裏選擇着一隻鳥，所以經常會在恍惚間情不自禁地將兩手握緊；但卻經常在清醒時發現，自己已兩手空空。

大師認錯

馬佳



如是我見

最近，圍繞北大校長「唸錯字」一事，搞得沸沸揚揚衆說紛紛。即使使人當即致函認錯了，還有人揪住不放，不免覺得有點過分。甚至還有一位專家出來「引經據典」，說什麼「北大校長才是國學大師，沒唸錯！鴻鵠的「鵠」就是念hao」云云，更令人有「越描越黑」之嫌。

有道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世界上沒有人不犯錯誤，北大校長也是人，不能被無限放大，何況人家已經認了錯，又何況他是一位化學家，偶爾唸錯一個字有什麼大不了呢？至於那位堂堂的雲南省長，居然在公眾場合將自己主政的省名「滇」念成「鎮」，實在說不過去。不過話又說回來，省長念錯一個字也不必窮追猛打口誅筆伐呀，還是那句話，是人都會犯錯誤！

這裏牽涉一個關鍵問題是——能否知錯而改。一個人偶爾犯點錯情有可原，可恨的是不認錯、不認帳。人生在世，真正偉大的不是位高權重、名揚天下，而是心懷謙卑、開誠相見。一如古希臘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無知……」又如印度大文

豪泰戈爾所說：「當一個人真正謙卑時，他便接近偉大了！」且舉兩個範例爲證：

藝術大師徐悲鴻一次在重慶舉辦個人畫展，一時嘉賓如雲、好評如潮。忽然有一老農指着一幅畫說：「這幅畫錯了，雌麻鴨尾巴哪有這麼長啊？」有人當即訓斥他：「你一個鄉巴佬胡說什麼？快走開！」徐悲鴻卻當即制止，想聽聽老農之言，老農說：「雌麻鴨的毛是麻褐色，尾巴很短的。」徐悲鴻當即認錯，並向老農鞠躬致謝。隔天又重新畫了一幅，專程到老農家求教。

當年錢學森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其導師是享譽世界的「超音速之父」馮·卡門教授。一日錢學森一項科學研究獲得成功，便興沖沖地向導師彙報。誰知馮·卡門教授聽罷還沒有弄清楚，就對錢學森說：「不！這不可能，你一定搞錯了！」錢學森不通，他堅信自己的研究結果是正確的，導師的話令他很糾結。令他萬萬想不到的是：翌日凌晨天還沒亮，有人敲門，他開門一看，竟是馮·卡門教授。馮·卡門教授佇立在門外，鄭重地向錢學森鞠了一躬，非常誠懇地對他說：「對不起，錢，昨晚我整整思考一夜，終於發現您的成果是正確的，我向您道歉！」

抗戰時期香港的四大副刊

趙稀方



小說香港

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學期刊較少，並且僅有的文學期刊都存在時間很短，只有在1933-1936的《紅豆》活動時間較長。

隨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批大陸文人南下香港，香港短時間內湧現出大量報刊，文壇異峰突起。就報紙文學副刊而言，最有名的是四大副刊。

《立報》由著名報人成舍我創辦於1935年，上海淪陷後停刊。1938年4月1日，中共投資2000元港幣，薩空了在香港復刊。薩空了請時在香港的茅盾編《立報》的「言林」副刊，茅盾答應了。茅盾在《言林》副刊「獻詞」中說：「《言林》不拘於一種戰術：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凡屬拿手好戲都請來表演。」《言林》刊登雜文、短論、詩歌等，主要作者有杜埃、林煥平、李南卓、黃繩、袁水拍等。爲適應香港的報紙風格，茅盾安排了一個連載長篇小說，那便是茅盾親自執筆的《你往哪裏跑？》，刊登於《立報·言林》193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據茅盾自己說，由於不太適應香港邊寫邊登的風格，這本長篇小說寫失敗了。此書後來於1945年在重慶出版單行本，改名爲《第一階段的故事》。《立報》三版上半版是本港消息版，下半版是由薩空了本人負責的副刊「花果山」，這個副刊連載了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桃花港》。四版上半版是國際新聞，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館」，仍然由薩空了編輯，刊載過金秉英的長篇小說《夢我》，也刊登讀者來信等。薩空了主編期間的《立報》，重視宣傳中共的理論政策，並發表來自於中共駐香港辦事處的資訊，還輸送香港進步青年去延安，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不過，《立報》的銷路並不好，據茅盾回憶：「那時候《立報》銷路不好，天天賠錢，大有維持不下去的樣子。原因當然是《立報》「孤軍作戰」，敵不過那些盤踞香港幾十年的黃色小報。」

皖南事變後，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剛從桂林和重慶撤退到香港的進步文人於1941年4月8日創辦了《華商報》。《華商報》社長范長江，總編胡仲仲，主筆張友漁。《華商報》副刊「燈塔」，由夏衍負責。在《燈塔》創刊日，夏衍發表了一篇《不能免俗的介紹——算是發刊詞》，其中提到：「本報是一張晚報，而《燈塔》只是一張晚報的文藝化的綜合副刊，所以我們這裏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臉，打諢插科，但他



▲《大公報》副刊曾是三十年代中國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陣地，圖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刊出的「文藝」大公報資料圖片

方面也並打算扯長了面孔說教，「燈塔」是我們讀者在一天工作疲勞之後，可以不費力氣地在燈下披誦的讀物，像一杯清茶，像一張小夜曲的唱片，要做到的是儘管不一定能夠滋養和振奮，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氣和清心。」《燈塔》的連載小說，最有名的是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刊登於「燈塔」1-29期。「燈塔」還連載了另外一些名篇，如巴人的《沉淪》、艾蕪的《故鄉》兩個長篇小說，其他還有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范長江的《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等。

如果說，《立報》和《華商報》較具政治格局，那麼《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則較具文藝色彩，顯示戰時中國文學的成就。

上海淪陷後，戴望舒於1938年5月南來香港。8月1日，《星島日報》創刊，戴望舒經陸丹林介紹應邀主持《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戴望舒並非左翼作家，他既是「文協」香港分會的理事和宣傳部負責人，又是國民黨「中國文化協進會」的理事和宣傳部主任，左右逢源。在《星座》上，戴望舒的長處是能夠團結了不同派別的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薈萃，正如他自己所號稱：「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星座》上出現了不少現代文學的優秀作品。1938年8月1日-6日，《星

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今天重溫這句話，老一代家長是會感到溫馨有體會的。

上世紀末，美國人創造了「直升機家長」這個詞來諷刺對孩子的過分保護。這樣的家長力圖在孩子頭上逡巡用自己意見代辦一切、而避免其子女童年經歷任何風雨；可這樣過度干預的結果是在孩子成年後卻必須獨自遭受人生的腥風苦雨。家長們以自己的心態去「保護」孩子；把孩子童年加工成了人造溫室，讓孩子把父母刻意營造的一切當成了自然，當成了必須。結果到了走向社會，到了工作單位，同事和領導卻不像父母這樣伺候你。這樣的孩子會變得沒有任何免疫力，是最容易得「病」的。有的甚至會反社會或返回家中龜縮半生。

美國如此，對我們，這現象有沒有警示和借鑒呢？

今年內地慶祝七七級入學四十周年。我是七七級，作爲過來人，我不認爲七七級一定優秀。當年上山下鄉我在鄉下考試，六十幾取一的錄取率。回顧那時的試卷，應該比今天的容易多了。我不認爲七七級贏在學問和智力；他們其後能相對成功些，應該說是贏在人生閱歷、贏在吃苦和放養的童年。

人是應該吃點苦的，特別是在小時候。因爲小，還能輸得起。

座》第1-6期，刊登的是施蛰存的連載小說《進城》6節。1938年8月7日-11月19日，「星座」陸續刊登了沈從文的連載小說《長河》67節。蕭紅還在重慶的時候，就把《曠野的呼喊》交給戴望舒，這篇小說從1939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在《星座》上刊載了一個月。到香港之後，蕭紅將她一生的代表作《呼蘭河傳》也交給戴望舒在「星座」上連載（從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在《星座》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還有端木蕻良的《大江》、蕭軍的《側面》、沙汀的《賀龍將軍在前線》等。戴望舒本人也在《星座》上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和譯作，著名詩作《元日祝福》就發表在1939年1月1日的星座上。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副刊馳名，是三十年代中國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陣地。抗戰以後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在香港創刊，「文藝」副刊由蕭乾主持。一年以後，蕭乾去英國，他推薦左翼作家楊剛接替自己的位置。港版《大公報·文藝》創刊的時候，《星島日報·星座》剛剛創刊兩個星期，兩個副刊都名家薈萃，不過由於編輯的來歷不同，《星島日報·星座》與《大公報·文藝》的作者隊伍還是有些差別的。戴望舒來自上海，熟悉上海的文人，尤其是現代派的文人，因此《現代》的老朋友施蛰存、杜衡、路易士等都積極爲《星島日報·星座》寫稿。蕭乾依靠的是北方京派文人的班底，沈從文、巴金、靳以等是主要撰稿人。當然，文學名家就那麼多，重複在所難免。如沈從文是《大公報·文藝》的前任，又是京派文人的首領，當然成爲蕭乾的堅強後盾，不過他同樣支持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伊始，沈從文一邊即在《大公報·文藝》上連載長篇小說《湘西》，他同時也在《星座》上連載長篇小說《長河》。由此，我們也可見沈從文在當時文壇的熱度。

蕭乾後來回憶說：「那時詩人戴望舒在編《星島日報》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們的聯繫比我密切。爲《大公報·文藝》寫稿的，則大多是從平津奔赴延安或敵後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幾所大學的。」從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兩部分作者，成爲《大公報·文藝》的重要特色。西南的文人主要指西南聯大文人群，他們和蕭乾的聯繫主要通過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孫毓棠、汪曾祺、穆旦等人。對西北延安文人的關注，更成爲彼時《大公報·文藝》的「亮點」。因爲延安文學在國統區遭封鎖，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於延安文學的報道特別引人注目。延安文人有不少蕭乾的朋友，他在接手《大公報》後發表過一封《尋找朋友，並爲「文藝索文」》的公開信，很快就有了回應。第一個給蕭乾寫信的是延安的嚴文井，繼之有南陽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蕭，還有卞之琳、丁玲、劉白羽，以至於魯藝的陳荒煤等。這些人在抗戰爆發後，先後到達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成爲延安文學隊伍的骨幹力量。與蕭乾聯繫上了以後，他們的作品就成了《大公報·文藝》延安作品的主要部分。在中共黨員楊剛繼任後，延安的作品增加更多。據統計，《大公報》港版《文藝》副刊上共發表延安作品118篇，蕭乾主編一年發表44篇，剩下74篇爲楊剛編輯發表。這其中有不少力作：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賀龍將軍》、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樣來陝北的》、何其芳的詩歌《夜歌》等。

正是由於這四大副刊，再加上爲數不少的文藝期刊，香港文壇在抗戰後迅速變得姍姍紫嫣紅，成爲了戰時中國文壇的中心之一。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都曾上《大公報》副刊上發表過作品 網絡圖片